



论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及其对记言文本文体的影响*

林训涛

摘要:文字的出现和史官职守的明确使先秦史官的文书写作成为可能。从殷商甲骨刻辞到周代《尚书》《逸周书》《国语》的文书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官的主体意识在逐渐觉醒。从口头语辞到文书写作的转变、甲骨刻写的布局、时空秩序的安排、摆脱神圣仪式限制的验辞书写等方面,体现了殷商史官主体意识萌芽。警戒君王、垂宪后世则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中的基础和核心,其表现在:对基于口头语辞的文字加工;整体语辞风格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具有一种从艰深古奥到明白晓畅的规律性;语气助词的数量呈现出一种由多到少的变化。商周史官主体意识影响了文书写作的文体特性:记言体史书的文体特征突出了篇名与“言”的关系;形成了庄重严肃的语言风格;记言文书写作中的语辞引用不断增多,既有经典,亦有口头语辞,涉及诸多文体。

关键词:史官;文书写作;史书;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3-0121-08

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官文化非常重视,甚至有将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之发端溯源至史官文化者。早期社会,在文字出现之前,史官已经参与了大量的仪式性的口头语辞活动;文字出现之后,在各种庄严的仪式中,口头语辞活动仍然不可或缺,但这种口头语辞活动往往与书写活动结合在一起。甲骨刻辞和早期史书是商周史官早期书写活动的集中体现之一,正是在这种早期书写中,仪式形态下的口头语辞活动逐渐被文字表达所代替,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转化过程中,甲骨刻辞和记言体史书开始出现。殷墟甲骨刻辞已经产生了史官主体意识的萌芽,而以《尚书》《逸周书》《国语》为代表的记言体史书,进一步清晰地反映出了史官的主体意识,并呈现出个性分明的文体特性。可以说,商周史官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文书写作的发展同步,并表现在文书写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尚书》

《逸周书》文书写作的文体特性还深刻影响到后代以《春秋》为代表的记事体史书和以《左传》为代表的言事兼记体史书的书写。

一、商代史官在刻辞文书写作中的主体意识萌芽

早期巫瞽史不分,史官与宗祝巫卜一起,以口头语辞活动事神。文字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使史官的口头语言活动中涉及重大仪式事项的部分逐渐文本化、信证化。这从殷商甲骨刻辞中可以看出来。殷商甲骨刻辞最早是作为见证性的呈现来静待神明裁决的信物。但作为见证,则需要补充一系列的内容,因此,完整的甲骨刻辞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即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前辞为干支、贞人;命辞为卜问内容;占辞为占卜预测发生之事;验辞为占卜后的应验情况^①。这四部分以问、答、释组成一个完整

收稿日期:2024-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先秦史官书写活动与早期文体生成研究”(20BZW103)。

作者简介:林训涛,男,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副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的过程。

在占卜的神圣仪式中,首先是一系列的祭祀活动,由贞人按固定模式向神灵进行口头提问,这种提问的内容就是命辞。接着是钻凿灼烧甲骨,再由商王根据甲骨灼烧后的兆纹进行判断,这种判断就是占辞。命辞和占辞是对仪式中口头语辞的文字实录,只有结合一定情景才能理解,离开具体情景,其将成为一种无头无尾的话语。因此,在记录口头语辞的过程中,“册”“史”将前辞和验辞补充上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字记录。从出土的甲骨刻辞来看,其中经常出现的“册”“史”,其职守不仅负责军事、礼仪,而且更多的是负责甲骨占卜中的文本书写,如董作宾就认为刻辞是“三千年前史官所亲手书写的文字”,“贞人即是史官”^[1],朱彦民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说:“贞人不是史官,而贞人集团之下那些专门负责记事并刻写文字的人才是真正的史官。所以可以确定,殷代的史官负责记录记事卜辞。”^[2]纵观殷墟刻辞,其实并非是记事的,而是就某一特定事件以口头语辞结合书写进行占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口头语辞是神圣仪式的主要内容,而书写活动应当是占卜之后的程序。口头语辞由贞人负责,而书写活动则由史官负责,正如信明华所言:“贞人应当并不大可能同时承担卜辞的契刻。至少在仪式现场,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文字来履行自己的职能。这也足以从侧面反映出,口头语言作为占卜仪式第一语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3]所以说,甲骨刻辞的出现标志着殷商史官以文本书写记录口头语辞并形成保存文献的过程。殷商史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主体意识的萌芽。

首先,在占卜仪式的口头语辞到文本书写的甲骨刻辞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发挥史官的主观能动性,合理运用专业素养。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4]吕叔湘认为“语言是直接的达意工具,而文字是间接的;语言是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因此,可以用“口语”和“笔语”来“区别表现形式为声音的还是形象的”^[5]。对应来看,占卜仪式中的口头语辞是“口语”,甲骨文则是“笔语”。章太炎《国故论衡·正赅送》云:“古者吊有伤辞,谥有谏,祭有

颂,其余皆祷祝之辞,非著竹帛者也。”^[6]非著于竹帛者正是口头语辞,占卜仪式活动中的命辞、占辞同样属于祷祝之类的口头语辞。“文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系统准确地传达和沟通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复合系统。”^[7]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准确地传达和沟通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同时,由于甲骨文字形复杂以及甲骨这种文本材料本身的原因,史官在“口语”向“笔语”的转变中,必须经过一系列语言的精细加工,力求以最精简的文字承载最大的信息量。这不仅需要史官具有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对史官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甲骨刻辞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史官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

其次,史官在布满兆纹的甲骨上镌刻文字,刻字的地方往往避开了占卜的部位,选择的地方如牛胛骨的骨筒或者是背面外缘、龟腹甲的甲桥背或龟尾甲正面的角落、龟背甲的顶部或内缘等。这种有意识地避开兆纹的做法,反映了史官具有自主选择意识。同时,在契刻时,史官一般会先把字形的横竖笔画进行分类,先刻卜辞中所有的竖画或横画,再旋转90度,接着刻竖画或横画,最后再旋转角度,刻上斜线。这样,能够让甲骨文在避开兆纹的同时使布局具有了法度俨然、浑然一体之美。正如杨飞所说:“甲骨文中许多篇章的字与字、行与行的布局都有大处着眼、构思缜密的特点。有横看成行,纵看成列的感觉,就像军阵,方正严谨。”^[8]另外史官在契刻的刀法运用上,有单刀法,也有双刀法,点画起止方圆结合,线条直曲相间,颇有韵味。这些说明史官在契刻甲骨时已经具有了审美的意味,而这种审美正是史官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再次,史官在契刻时,一般会补充天干地支标示的占卜日期,有时也会补充占卜的地点,这些构成了前辞,如:“癸未卜在霍贞王旬无咎在六月甲申。”(《合集》^②35887)“壬午,王于召,延田于麦麓,获兕。亚锡……”^③在这种事神的虔诚中,史官看似按一定规范补上了时间和地点,其实背后的逻辑是史官对于时空秩序的重视。这种时空秩序中隐藏着占卜仪式的庄严和史官的价值判断。时间与空间具有微妙的关系,“由

于描写停留在同时存在的人或物上,而且将行动过程本身也当做场景来观察,所以它似乎打断了时间的进程,有助于叙事在空间的展现”^[9]。甲骨刻辞本身属于严肃的政治、文化记述,史官的文本书写尽管是中立性质的时间线性顺序,但记录者作为政治、文化精英的身份,决定了甲骨刻辞的结构体制必然受到王权和礼制的影响。在大量的刻辞中,最常见的是只有“日期+卜+事件”的范式,偶尔会出现诸如“在霍”“王于召”这样的空间记述,但还有许多刻辞是没有时空描述的。相对于有时空描述的刻辞,没有出现时空的刻辞,实际也就具有了时空的意义。甲骨刻辞的时空秩序,反映的也是史官的主体意识。

最后,在占卜的神圣仪式中,前辞、命辞和占辞往往按一定的程序和范式进行;而验辞,则是神圣仪式之后的补充,是史官对占卜结果验证之后的追加记录。因此,验辞的文本书写往往能够摆脱神圣仪式的限制,更能体现史官的主体意识。如:“贞:翌辛丑不其启。王固曰:‘今夕其雨,翌辛[丑]雨。’之夕允雨,辛丑启。”(《合集》03297反)此刻辞记录的是某个庚子日进行占卜以预测翌日之辛丑是否雨停。商王根据兆象断定庚子傍晚至辛丑都会下雨,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庚子傍晚确实有雨,而辛丑整天放晴。在此刻辞中,非常有意思的是“之夕允雨,辛丑启”这段验辞。验辞在验证“之夕允雨”的事实之后,又记述了“翌辛[丑]雨”的预测失误。这种情况在刻辞中比较罕见。实际上,占辞和验辞可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有时候为了保证商王的超人智慧或神圣地位,与占辞不符的验辞可能不作记录,或者忽略占辞而仅记验辞,“一种方法是在记录结果时,验辞顾左右而言其他,不正面讨论命辞的主题;另一种方法是不记占辞,使商王得以摆脱责任,保住面子”^[10]。此则验辞记录了商王预测的失误,正是史官在文本书写中主体意识的极大体现。

二、西周史官在记言文本书写中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殷商之后,史职事神色彩慢慢减弱,事君职

责加重,史职所从事的事神文辞也逐渐转为事君文辞。当时,史官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专门负责记录君王言行,但在早期,史官记录的主要是君王之言。刘勰《文心雕龙·诏策》:“皇帝御宇,其言如神。渊嘿黼宸,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4]262}刘勰梳理了“诏策”的源流,认为其来源于“命”。“命”的文体功用在于“制性”,古代君王之言由于政治环境和施政目的不同,而由史官根据记录制成命、诰、誓等各种文体,作为君王意志的体现而颁布天下。命、诰、誓等文体都与君王言说有关。这些君王言说最开始可能是口授的即时发言或发言大意,而史官则出于及时记录的需要,可能用极为简要的言语进行初步记录,然后才根据行文规范进行整理、润色,最后在特定的场合宣读并发布。这些王命往往意义重大,在作为正式公文发布之后,还必须作为文献进行归档收藏,这也是周代记言体史书形成的过程。考察以《尚书》《逸周书》《国语》为代表的记言体史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记言为重心的记言体史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从整体文体风格的角度来看,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体现了史官在文本书写中个性色彩的增加,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史官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

第一,西周史官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史官对基于口头语辞的文件加工中。警诫君王、垂宪后世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的基础和核心部分。

史官对君王口头语辞的加工包括:其一,在记录的言语之前加上固定搭配词汇“王若曰”“周公曰”等,突出言语主人身份,引领所记言语,并加上时间、地点和人物,进一步完善内容,如《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郟,太子发曰……”^{[11]236-237}其二,添加情景描述,交代发言的原因、背景,突出文辞的文体性质,如《尚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12]342}其三,记言与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描述浑然一体,记言与记事结合,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形象,语言生动,结构清晰、合理,如《逸周书·尝麦解》

载有对周王发言之前和之后的详尽复杂的典礼环节的记述^④。这种史官对文件的加工,大致上就是记言体史书形成的初步过程。在主体意识的作用下,史官对文辞产生的场景描绘、阐释因由、补充过程,使得这种文字记录与一般的礼法文书区别开来。同时,并非所有的君王与大臣们的口头语辞的文字记录都能成为史书,只有那些警戒君王、垂宪后世的语辞才有可能成为史书。可以说,早期记言体史书的雏形是出于对君王与大臣们对话的口头语辞的文字记录,后来的史官由于警戒君王、垂宪后世的需要,把其中部分具有史鉴意义的文字记录整理成记言体史书。另外,从文本书写的加工方式来看,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简单加工与复杂加工的区别并不能体现出记言体史书中具体篇章时代的区别。

第二,从《尚书》《逸周书》到《国语》,整体语辞风格呈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特征,具有一种从艰深古奥到明白晓畅的规律性,体现了西周史官主体意识的发展。

作为传世的第一部记言体史书,作为口头语辞的文字记录,《尚书》庄严典雅、谨慎严密,且所记语辞跨越年代较长,让读者感觉到艰深晦涩。《逸周书》产生年代可能稍晚于《尚书》,所谓“上翼六经,下笼诸子,宏深质古”^⑤,虽然语言风格同样庄重典雅,但读来已经有别于《尚书》的艰深,这可能与其文体功用有关。如首篇《度训解》:“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口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潘振云认为:“度,法度;训,教也。解其义以示人,故曰《度训解》。”^{[11]2-8}《度训解》的语言已经非常清新自然,迥异于《尚书》。《逸周书》的篇名皆冠之以“解”字,“解”字本来就具有解释意义、教导后人的含义,因此,自然流畅是其应有之义。即使是《逸周书》中产生年代较早、描述武王克商的《克殷解》,相对于《尚书》来看,其语言的自然流畅无疑是一大进步。《克殷解》:“周车三百五十乘牧野,帝辛

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帝辛奔内,登于廩台之上,屏蔽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11]339-355}其中载录的尹逸所读的策书,尽管属于先秦礼法文书,语言同样不失自然晓畅。相比于前二者,《国语》的语言则更加贴近口语,明白易懂。如《周语下》载单穆公谏周景王铸大钟,其中既有日常浅显道理之论,也有民谚的引用: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13]82}

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13]86}

君臣对话,阐释道理,却能平实自然,寓治国大要于日常道理,展示了史官记言风格的变化。《国语》中更有幽默风趣的记言,生动活泼,读之使人忍俊不禁,如《晋语四》载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厌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将焉用之?”遂行。^{[13]229}

这里,重耳乐不思蜀、不思进取的态度,子犯的机智,相映成趣,非常有画面感和戏剧性。

第三,从《尚书》《逸周书》到《国语》,同样为记言体史书,但在史官的文本书写中,语气助词呈现出一种由多到少的变化。语气助词是指用在句中或句末表达语气、增强情感的虚词。它的变化,正好说明先秦史官在文本书写中,记言从逐字实录到不断润色加工的发展过程,以及强烈介入的主体意识。

《尚书》中,语气助词如都、咨、俞、嗟、呜呼、

吁、噫、哉、乎、於等,大量反复出现。如《虞书》中,《尧典》有“咨!汝羲暨和”“吁!器讼可乎”“都!共工方鸠僝功”^{[12]251-256}等带有语气助词的句子14处,《舜典》有16处,《大禹谟》有9处,《皋陶谟》有13处;其他如《夏书》《商书》《周书》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语气助词。这些语气助词的大量反复出现,并非口语化和通俗的表现,而是说明了当时史官记言实录的文本书写原则,同时也反映了早期史官在记言中主体意识不足的问题。

《逸周书》一些类似《尚书》的议论对话的篇章中,语气助词仍然比较多,如卷三中,《酆保解》出现“呜呼”“哉”等词有6处,《大开解》无,《小开解》有8处,《文傲解》有7处,《文传解》有2处,《柔武解》有1处,《大开武解》有8处,《小开武解》有2处,《宝典解》有2处,《酆谋解》有2处,《寤敬解》有3处,《武顺解》和《武穆解》无。但较之《尚书》,语气助词出现的频次已经是大大降低,如《逸周书》卷一,《度训解》《命训解》《常训解》《余匡解》中没有出现语气词和感叹词,唯《文酌解》出现过2处。《国语》中有大量的议论对话,却很少有类似于《尚书》的语气助词出现。

从《尚书》和《逸周书》语气词和感叹词分布的情况来看,其主要出现在议论性的对话中,而一些布告性、阐释性的篇章中,语气词和感叹词出现较少。但《国语》中,无论是议论性的对话,还是布告性、阐释性的篇章,语气词和感叹词都大大减少。这说明了先秦史官在记言中经历了一个由较为忠于原话的逐字记录到逐渐增加文学技巧、润色加工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史官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要之,记言体史书文本化的历程,同时也是史官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正是在记言中,史官们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增强,通过文字将这些个性化的情景描述、过程描述、因由探讨以文学的表现手法补充了进来,形成了历时性的完整的记言体史书。而《国语》作为成熟的记言体史书,在记言中刻画人物形象,通过人物言语表现人物性格、衬托人物形象,来阐释历史问题,表达史官的史观。它与记事体史书、言事兼记体史书分庭抗礼,具有创立记言体史书的功绩和意义,

是先秦史官早期文本书写活动的成功之作。

三、商周史官主体意识觉醒对刻辞及记言文本文体特性的影响

殷商史官主体意识觉醒对刻辞文体特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辞尚体要”与“文雅之辞”的对立统一之中。不管是神圣仪式下“沟通神人”的原因,还是甲骨材料不易刻写的原因,刻辞都呈现出了一种极其简要的文体特性。同时,刻辞在神圣仪式的严格程序限定下,“内部也是富有变化的,文法形式多种多样,用词灵活多变,一义可有多辞,句式有繁有简,有详有略”^[14],正好验证了《周礼·大卜》孙怡让正义“凡命龟必有文雅之辞”^[15]的论断。这种对立统一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商代占卜是一种宗教背景下的非常神圣的活动,内容仅限于战争、灾祸、王病等国之大事,一切程序及言说体系、文本形态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商代史官在书写刻辞时,必须在主体意识之下经过一番极其严谨的构思,并充分发挥史官娴熟精确的文字功夫,使刻辞整体上具有了“辞尚体要”的文体特点。二是,作为“绝地天通”之后的知识精英,具备极高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的史官在书写刻辞时,除了遵循仪式规范之外,追求文本的书写之美、布局之美、韵律之美、文辞之美,方寸之间有天地,成为史官主体意识的必然追求。总之,史官书写甲骨刻辞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商王权威和统治秩序,其主体意识也是为了此目标而努力,却在客观上成为后代“文以载道”的渊薮,极大地影响了西周史官在记言文本书写中对文体的自觉追求。

因为书写环境和场合的不同,同时也因为地位的不断提升,西周史官在记言汇编的文本书写中,警戒君王、垂宪后世成为其主体意识觉醒的强烈追求。这不仅使记言文本书写具有史官浓烈的个人色彩,而且使之形成了鲜明的文体特性。

首先,从《尚书》《逸周书》和《国语》等记言文本书写的体例来看,其最主要的文体特征是篇名与“言”有关。“言”字在甲骨文中象木铎倒置之形,与“告”“舌”初义相同^⑥，“法言”是其基本含

义。西周史官以“言”为篇名,凸显了警诫君主、垂宪后世的强烈主体意识对文体特性的影响。

《尚书》历来文类众多,其篇名大多具有鲜明的文体辨析度。孔安国首举《书》有六体之说,《尚书序》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12]²³⁸刘知几《史通·六家》:“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16]²林之奇《尚书全解》:“《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是称六体。”^[17]《尚书》六体中,谟、训、诰、誓都具有言旁,命有口部,也间接与言有关。而典,甲骨文作,象双手捧册之形,或书册敬存于几案之形,寓意为记载古代制度和先公先王语言的经典或历史文献,有垂范后世的崇高地位,如《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12]⁴⁶⁸,表明了其早于《尚书》的形成年代。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18]朱自清《经典常谈》:“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19]刘起舒说:“‘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下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词,而且多是军事行动的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经过或某项专题史实。”^[20]参详诸家之说,尽管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但基本上都是从语言角度来定义“《尚书》六体”的。

《逸周书》七十一篇的情况与《尚书》有相似之处。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自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作也。”^[21]说明了《逸周书》的内容都与“言”有关。《逸周书》第七十一篇《周书序》对各篇的生成作了说明,也是从“言”的角度进行:

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殷人作,教民不知

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文王唯庶邦之多难,论典以匡谬,作《刘法》。文王卿士谗发教禁戒,作《文开》。维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观天以谋商难,作《保开》。文王训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鄴,命周公谋商难,作《鄴保》。^[11]¹¹¹⁷⁻¹¹²⁴

《度训》《常训》的题目本身就是“言”的性质,《刘法》是“论典以匡谬”,《文开》是“谗发教禁戒”,“谗”即告,《保开》《鄴保》皆与“谋”有关,可见,“言”是《逸周书》的篇名特征。《逸周书》中各篇都命名以“解”,如《度训解》《命训解》《常训解》等,“解”亦与“言”相关。《玉篇》:“解,释也。”《仪礼·大射仪》贾公彦注“解纲”:“解,犹释也。”^[22]《文心雕龙·书记》亦云:“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谏……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4]³⁴³⁻³⁴⁴刘勰说得尤其清楚,“征事以对”,正是《逸周书》各篇命名以“解”的原因,所以《逸周书汇校集注》在《度训解》中引潘振云语:“度,法度;训,教也。解其义以示人,故曰‘度训解’。”^[11]

《国语》书名和分类已经体现了“言”的文体特点。相传春秋时有盲人史官,他们的职责是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给君王听。据王树民统计,《国语》中五次提到“瞽史”,如周厉王时邵穆公论天子听政时提到“瞽史教诲”,春秋时齐姜、董因引瞽史记以激励重耳等,“都表明‘瞽史’的职务是单独的,是在乐师和太史之外的一种官职”^[23]。瞽蒙等盲人史官按制度规定所讲述的史事被人记录下来,并集录成书,就叫作《语》,编辑之时按国别分类,就是《周语》《齐语》等,总称《国语》。另外,《尚书》《逸周书》之名“书”者,亦与“言”有关,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指出:“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4]³⁴¹⁻³⁴²因此说,言语正是《尚书》《逸周书》《国语》等记言体史书的最根本的文体特征。

其次,记言文本书写中庄重严肃的语言风格,同样受史官警诫君主、垂宪后世的强烈主体意识的影响。董芬芬认为:“《尚书》中所载三代圣贤之辞,已经具有立言以传后世的意义。”^[24]史官记言的目的在于保存历史,建立威信,形成某

种传统的潜在力量,以维护礼制。言语是一种资本,而文字则是一种权威,言语被记录下来,变成了文字,不仅增添了权威性,还凸显了约束力。“即使信息的接收者只是单独一个人,而且跟发送者的关系很密切,信息一旦被书写下来就被赋予某种庄重得多的功能。”^[25]制度赋予史官的记言文本书写成为一种合法行为,使其对君王的言行形成巨大的约束力,但君王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礼制,在此过程中,史官也须慎重而不失敏感,以礼制为考量,在记言文本书写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庄严的语言风格。《尚书》《逸周书》的语言风格如斯,语言风格相对来说更为活泼流畅的《国语》亦不失庄严。要之,记言文本书写是史官在制度保证下的一种充满力量感、庄严感的行为,在充分表达君王意志的基础上,体现了史官的价值和意志。

最后,记言文本书写中的语辞引用不断增加,既有经典,亦有口头语辞,涉及诸多文体,同样反映了史官警诫君主、垂宪后世的强烈主体意识。《尚书》五十八篇中,有四处标明了“古人有言”,另有三处标明了“歌”。《逸周书》有两处引用了《夏箴》,另各有一处引用了《诗》和《开望》(疑为《归藏·启箴》)。《国语》中的引用则多达几十次,引用最多的是《诗经》和《尚书》,且称呼不一。如《诗经》,既有称《诗》,亦有细化至《周诗》《颂》《小雅》《大雅》《商颂》《周颂》《郑诗》《曹诗》等;如《尚书》,既有称《书》,亦有细化至《夏书》《汤誓》《盘庚》《太誓》《周书》等。值得注意的是,《国语》的引用不仅有《诗》《书》《夏令》《秩官》等已成经典的书面语辞,亦有当时流传的歌、谣、箴、谚、廋语、古人言、训语、论赞(君子曰)等口头语辞。这反映了一种情况,即从较早的《尚书》《逸周书》到年代稍晚的《国语》,呈现出引用越来越多的趋势,涉及不同的文体和语辞形态(经典书面语辞形态和口头语辞形态)。记言文本书写中出现引用的修辞手法,是西周史官主体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引经据典和引用古语名言,一方面是为了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占据道义的高地,使之更具冲击力和说服力,同时也能启发与话者从新的视角进行思考,从而激发与话者的兴趣和

积极性,使之更易于接受。因此,引用是一种高超的语言艺术,其有意识的娴熟运用与史官强烈的主体意识紧密联系。同时,歌、谣、箴、谚、廋语、古人言、训语、论赞等口头语辞通过史官的文字载录,出现在史书中,由口头语辞形态完成了向书面形态的转化,产生时代与《国语》相近、言事兼记体的史书《左传》亦是如此,这进一步反映了史官警诫君主、垂宪后世的强烈主体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国语》论赞体的出现,开启了史官书写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记言是商周甲骨刻辞及传世文本中最普遍的存在,刻辞之外,《尚书》《逸周书》《国语》,甚至是先秦诸子典籍如《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也莫不如此,近代考古出土文献如马王堆汉墓《春秋事语》、郭店楚简、上博简中也多有记言的文本书写。唐代刘知几早已指出:“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记言为首。”^[16]³⁷⁹商周君王口含天宪,君无戏言,言出法随,史官记录君言,使之成为维护王朝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当时制度建设的必要。因此,无论是履行“神人沟通”职责,还是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态度,商周史官记言的文本书写在客观上成了一种反映生命价值的行为。在这种记言文本书写中,史官不仅逐渐确立了书写规则,而且建立了文体规范。这种文体规范一方面体现了“言”的基本,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史官记言的终极目的,即垂法立宪,维护礼法。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商周时期,巫史分离,史官职守形成了清晰的界限,重要性也不断得到加强,因而史官有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更大空间,使其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成为先秦历史舞台的重要角色。

注释

- ①孟世凯:《甲骨文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②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以下简称《合集》。③商承祚辑:《殷契佚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933年版。按:此为殷墟大墓骨片刻辞,时代当为商末。④林训涛:《西周史官书写中的主体意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2日。⑤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序》,参见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48页。⑥徐中舒主编:《甲骨文

字典》，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22页。⑦林之奇：《尚书全解》，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5页。

参考文献

[1]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节录[M]//姜可瑜.初学编:甲金文论著选读、甲骨选片.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52.

[2]朱彦民.由甲骨文看“史”字本义及其早期流变[J].殷都学刊,2015(4):6.

[3]信明华.殷商卜辞的仪式渊源与文本界限[J].文学评论,2023(1):179.

[4]刘颺.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照明,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4卷 语文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3.

[6]章太炎.国故论衡[M].陈平原,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4.

[7]达勒瓦.艺术史方法与理论[M].李霞,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1.

[8]杨飞.中国书法与绘画一本通[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4.

[9]热奈特.叙事的界限[M]//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51.

[10]吉德伟.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M]//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123.

[11]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左丘明.国语[M].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4]陈炜湛.卜辞文法三题[M]//宋镇豪,段志洪.甲骨文献集成:第18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67.

[15]孙诒让.周礼正义[M].汪少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5:2329.

[16]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

[18]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于北山,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

[19]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0.

[20]刘起釞.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9.

[2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5-1706.

[22]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2253.

[23]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212.

[24]董芬芬.春秋辞令文体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94.

[25]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张祖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99.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a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Impact on the Stylistic Elements of Recorded Speech Texts

Lin Xuntao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defined roles of the historical officials ensu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extual record by pre-Qin historians. The evolution is evident from the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in the Yin-Shang period to the textual writing of *Shangshu*, *Yi Zhoushu*, and *Guoyu*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These marks the burgeoning of historia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transition from oral to written language, the layout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arrangement of chronological and spatial elements, and the emancipation from the confines of sacred rituals in divination text signify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Yin-Shang historians. For Western Zhou historians, earnest counsel to the king and establishing laws for posterity constituted the essence of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adaptation of oral speech into written form in which shows a linear progression in language from enigmatic to straightforward and a tendency towards fewer mood particles.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Shang-Zhou historians shaped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extual writing: firstly, historiographical books in the "recorded speech" genre emphasized the link between the title and the content; secondly, a solemn and dignified language style emerged; thirdly, The use of quotations in "recorded speech" texts became more prevalent, incorporating both classical texts and oral traditions and spanning various styles.

Key words: historians; textual writing; historical books; style

[责任编辑/随 斋]